红色印记

贾拓夫：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引路人

中央红军长征落脚点的选择经过6次变化，最终确定在陕北。决策过程中，一张报纸和一个人起到关键性作用，这张报纸是《晋阳日报》，这个人是贾拓夫。

贾拓夫（1912年—1967年5月7日），字孝先，原名贾耀祖（曾用名贾元、拓夫、红光、虹光、关烽、绍先），籍贯陕西神木县（今神木市），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之一。

1926年秋，贾拓夫考入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这所学校由早期共产党员李子洲任校长，在大革命时期与榆林中学并称为陕北两大“红色学校”，为革命事业培育了大量人才。贾拓夫在校品学兼优，常结合时事撰写新诗和小说，张贴于校园墙报，颇受校方和教员器重。据史料记载，他在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是神木县第一位共青团支部书记。

国共合作破裂后，绥德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受到国民党当局的严查，许多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师被撤换。作为校团支部书记、绥德学生联合会主席，贾拓夫也被开除了学籍。此后，他回到家乡神木，以教员身份秘密开展党团工作。

1928年4月，贾拓夫由共青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随后担任共青团陕北特委组织部部长等职。1929年3月，贾拓夫任共青团陕西临时省委委员；同年7月，改任团陕北特委宣传委员。在此期间，他参加了在榆林召开的红石峡会议，结识了刘志丹，这段交往对他日后成长为坚定的革命者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0年7月，贾拓夫被任命为共青团陕西省委委员兼团西安市委书记，来到西安开展工作。同年10月，因叛徒出卖他不幸被捕入狱。由于缺乏确凿证据，敌人既不愿放人又无法定罪，他被关押不久后成功越狱。出狱后，他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1933年7月28日，中共陕西省委在西安骡马市福盛楼饭馆以聚餐为掩护秘密开会，因叛徒出卖暴露，特务包围了饭馆。省委书记袁岳栋和红二十六军政委杜衡刚走出饭馆即被捕，贾拓夫则趁结账之机从后门脱险。他随即通知省委、省军委其他负责人迅速转移，疏散可能暴露的干部，使陕西地方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避免了更大损失。

1933年底，贾拓夫奉命前往江西瑞金中央苏区。1934年1月，他先后出席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执委。会后，他留在瑞金中央局白区工作部，协助陈云工作，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部长、白区工作部部长。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开始长征。贾拓夫随军踏上了漫长的战略转移之路，成为陕北籍干部中唯一全程参与长征的人。

长征途中历尽艰辛。据贾拓夫长子贾虹生回忆，父亲曾给他讲过，行军途中粮食断绝，战士们煮皮带充饥；有时前队食用青稞无法消化，粪便中可见完整麦粒，战士们便捡拾洗净重新煮食。面对粮食紧缺的困境，中央军委曾在毛儿盖和芦花城分别设立筹粮委员会，贾拓夫担任芦花筹粮委员会委员，带领红军战士深入藏区筹粮熬盐，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

1935年9月12日，中央在四川俄界（今甘肃境内）召开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在接近苏联的地区创造一个新的根据地。

俄界会议后，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翻越岷山，抵达甘肃哈达铺镇休整。在这里，聂荣臻从搜集到的旧报纸中注意到一份阎锡山方面主办的《晋阳日报》，上面刊登了一篇关于陕北军事形势的报道，称刘志丹领导的红军已占领多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此外，《大公报》等报刊也对陕甘红军和根据地有所报道。通过这些报纸透露的信息，党中央第一次确切得知陕甘地区仍有红军和根据地存在。

聂荣臻将这份报纸送到司令部，叶剑英看了后急忙找到贾拓夫。贾拓夫高兴地说：“我们陕北是个闹革命的好地方，群众生活艰苦，迫切要求革命，加上穷乡僻壤、山高沟深，可以和反革命势力周旋。”

毛泽东得知报纸所刊消息后，多次找被称为“陕北通”的贾拓夫详细询问陕北情况。贾拓夫将1933年7月陕西省委被破坏以前，陕甘游击队、红二十六军的活动及陕西革命斗争等情况作了全面汇报，并建议中央到陕北立足。

听完贾拓夫的汇报，据后人回忆，毛泽东兴奋地说：“别说有几万红军，能有一万也就好了。”他转身向身边的谢觉哉说：“看来刘志丹在陕北至少开辟了一块根据地，到了陕北再说吧。”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任红军总政治部白区工作部部长贾拓夫带领



先遣队和一部电台，四处寻找陕北的红军和中共组织。10月24日，他在甘泉县下寺湾找到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及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11月2日，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到达下寺湾，与陕北红军成功会师。接着，贾拓夫又赴安定县（今陕西子长）瓦窑堡，协同王首道、刘向三等接管了执行“左”倾错误的陕甘晋保卫局，按照中央指示，释放了被错捕的刘志丹等一大批干部，并恢复了他们的领导职务。

西安事变爆发后，贾拓夫作为中共代表之一随周恩来到西安。此后，贾拓夫长期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工作，历任常委、秘书长、宣传部部长等职。

1949年5月20日，古城西安迎来解放。几天后，37岁的贾拓夫从延安来到西安出任中共西安市委书记兼市长。此前，西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已成立，贾拓夫担任第一副主任，参与接管筹备工作。履新之际，他赋诗一首，抒发对西安解放的欣喜之情——

长安别来已十年，故地重逢景非前。
全城解放歌声响，满街红旗迎风展。
贼昨犹以为穴巢，民今拔云见青天。
因怀往事访故人，几番昂首望终南。

【根据中共榆林市委党史研究室（榆林市地方志编纂研究室）提供资料，由实习记者王璐、记者赵婧整理】

人文风物

咸阳“南大门”陈杨寨的前世今生

□ 段旭政

沿西安地铁一号线往西走，过了沣河有一站叫陈杨寨。这名字听起来普普通通，念出声来的时候，唇齿之间有一种风尘仆仆的况味，像是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喊了一声旧时的地名，声音被风吹散了，落在这片土地上，就成了这两个姓氏和一座寨子的故事。

咸阳古渡几千年，河南街村就守在渡口边上。渭河上没有桥的时候，南来北往的人过河全靠渡船。河南街就是渭河南岸最热闹的地方。明清时期，河南街村的渡口是通往县城的必经之地，也是丝绸之路在渭河南岸的必经之地，与咸阳城一河之隔，实际上就是咸阳城南街向南的延伸。那时候从西安方向来的人要去咸阳，得先在河南街落脚，等船摆渡过去。河南街是名副其实的咸阳“南大门”。

1934年，西兰公路动工，从西安经咸阳、礼泉、乾县、永寿、彬县、长武进入甘肃，一路向西到兰州，全长七百多公里。路修通了，车也通了，可渭河横在中间，汽车到了河边照样得停下来等渡船。河南街村的渡夫班专门负责摆渡过往车辆，渡口依旧是咽喉，河南街依旧是那个“南大门”。

真正的变化发生在1954年，咸阳“渭河一号”桥建成通车。当时中苏还在“蜜月期”，此桥由苏联专家设计，是陕西省“一五”重点工程，也是渭河咸阳段的第一座公路桥。其时，位于河南街东早先有一座铁路桥，只过火车，通到咸阳老火车站。

“一号桥”通了，西兰路改线至此。从此，陈杨寨成为咸阳“南大门”，吴家堡成了“北大门”。桥一通，渡船就停了。河南街的渡口渐渐冷清下来，“南大门”的角色就这样从渡口边上的河南街，交到了桥头上的陈杨寨手里。千年古渡挥一挥手，正式成为历史。

陈杨寨的兴起，说到底就是一座桥一条路的事。桥把人流、物流、车流从水面上搬到了路面上，而陈杨寨恰好站在了这条路的路口。汽车从“一号桥”上疾驰而过，不再需要在河南街等船过河。桥南端就是陈杨寨，西兰公路从村中穿过，南来的北往的，下了桥第一脚踩的就是陈杨寨的地界。

“一号桥”是当时渭河咸阳段唯一免费通行的公路桥，车流量极大，陈杨寨十字很快成了咸阳南郊最繁忙的路口。十字以东、陈杨寨以南紧靠西兰路，这里建成了蔬菜批发市场，一直是西北地区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蔬菜远销四川甘肃。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陈杨寨一大半人靠着在菜市场过磅营生。因市场建在陈杨寨的地界，所以陈杨寨人垄断了过磅生意。因着路桥地理因素，陈杨寨人也做其他过路生意，再加上人勤劳朴实，陈杨寨成了渭河南岸响当当的富裕村子。

西兰公路从西安到兰州，在咸阳段一路走来，名字换了好几茬。因为原名字体现不了咸阳的主体性与地位价值，所以老西兰路在咸阳的这一段要改名。2005年正式命名为秦皇路，取自秦始皇之名号。咸阳是秦都，秦始皇一生霸业尽在此地，路以秦皇为名，算是把这座城市的根脉写在了路牌上。

陈杨寨十字往南通往沣西新城，翻过高速公路，在沣西的部分，建成之初叫作秦皇大道，之后改叫丰邑大道。改名的理由有两条，一是沣西新城的地界更多体现的是周文化，用“秦皇”不完全对得上；二是和咸阳的秦皇北路、秦皇中路、秦皇南路重了名。新名字取“丰”字，既指沣西，也指丰京遗址，周文王当年迁都于此，“文王伐崇，作都于丰”，丰邑就是这段历史的注脚。一条路的名字，就这样从秦回到了周。

陈杨寨地铁站建在陈杨寨十字原位上。十字往市区方向，以前放过秦皇坐车出巡的大型雕塑，后来十字改转盘，雕塑移到了中华广场，再后来又扩秦皇大道世纪大道，加上修地铁，转盘又改回十字，淳化大鼎从“南大门”又搬到了“北大门”吴家堡转盘。现在陈杨寨上部为十字，下部为地铁站。

地铁在建时工程名叫“秦皇南路站”，开通后改用了陈杨寨这个名字。站名是从旁边的陈杨寨村或者说是陈杨寨街道办来的。关于陈杨寨街道办的来历，得先从沣西说起。解放后建公社，1961年渭河南岸属秦都区的有沣桥、钓台两个公社，大体以沣河为界，东为沣桥，西为钓台，陈杨寨属钓台。1962年，缩公社规模，钓台析出沣西公社，沣桥改为沣东公社。“文革”期间，公社及大队全改名，后又恢复。1984年，政社分设，公社改乡，后乡改镇，陈杨寨属于沣西镇。

伴随西咸一体化，西咸新区设立。2001年秋天，沣西镇拆成了钓台和陈杨寨两个街道办事处，西宝高速公路以南的还给了钓台，高速公路以北的设立陈杨寨街道办。大体是因为陈杨寨居中且最为富庶，街道办驻地设在了陈杨寨，形成了陈杨寨街道办。

陈杨寨街道地处咸阳南郊，有“咸阳南大门”之称。全办辖区面积不算大，但位置紧要，距市中心不过几百米，离西安也就八公里出头，世纪大道穿境而过，交通便利、商贸繁荣。如今下辖17个社区、1个行政村。这个村叫曹家寨，目前没被拆迁，尚保留有部分土地，接近当年农村的样子。位于渭河南岸三号桥桥头，新的蔬菜批发市场也搬到了这里，似乎残存着一点当年陈杨寨的影子。

曹家寨下辖的原安谷村设有地铁安谷站。安谷，安放谷神，一个祭祀社稷的地方。陈杨寨和安谷同属一个街道，一个祭祀谷神，一个守望家园。谷神管的是收成，寨子管的是安全。农耕文明最朴素的两大愿望——有粮吃、有墙挡，在这两个地名里各占了一个。

时至今日，陈杨寨的寨墙早就没有了，寨门也没有了，连寨子的轮廓都找不到了。陈杨寨的村民经过城市化，大都安置到了一个叫陈杨新界的小区。寨子没有了，陈杨这个名字，像蒲公英一样散开，一些飘到了街道办，一些飘到了地铁站，还有些飘到了新界，飘到了路牌和身份证上的地址栏。

文史馆的故事

《夏声》杂志与清末陕西的革命先声

□ 杨媛

在陕西省政协文史馆的馆藏中，静静躺着几册泛黄的《夏声》杂志。纸页间虽已斑驳，字里行间却仍似有风雷之声。这并非寻常的旧刊物，而是百余年前，一群陕西留日学子在风雨如晦的时代里，为三秦大地点燃的一束革命星火。它不仅是同盟会陕西分会的舆论喉舌，更是连接海内外革命力量的枢纽，深刻影响了陕西近代民主革命的进程。

《夏声》的故事，要从一份夭折的刊物《秦陇》说起。清末，随着民主革命思潮在海外留学生中兴起，陕西留日学生党积龄等人率先创办《秦陇》杂志，计划每月发行一期，每期刊登四万字，试图为闭塞的西北引入新思想。然而，这份寄托着期望的刊物，从一开始就命运多舛。眼看发行期限将至，稿件却迟迟未能备齐，两位原定的总编辑也不辞而别，刊物一度停摆。党积龄四处奔走疏通，又临时邀请高又尼接手总编工作，第一期刊物才勉强付印。但由于临时接任未经选举程序，引发了内部争议，这份先天不足的刊物最终半途夭折。

《秦陇》的失败，并未浇灭陕西革命志士的热情。为守住来之不易的舆论阵地，同盟会陕西分会决定重整旗鼓，创办一份全新的刊物。1908年，《夏声》杂志在日本东京应运而生。它的创办，凝聚了陕西留日进步学子的全部力量，不仅同盟会会员全员参与，更广泛吸纳了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加入。杂志社在东京小石川区竹早町租赁房屋作为社址，杨铭源、李元鼎、赵世钰等人常驻于此，既处理社务，也兼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事务，将革命工作与办刊紧密结合。

与此同时，部分不甘心《秦陇》停刊的陕甘学生另起炉灶，创办了《关陇》杂志，与《夏声》形成了既竞争又互补的局面。可惜《关陇》发行不久便停刊，唯有《夏声》坚持下来，成为清末西北革命最稳定的舆论阵地。

《夏声》对外宣称以“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为办刊宗旨，是一份学术性刊物。但在清末高压环境下，这不过是一层保护色。它的真实使命，是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唤醒民众觉悟。

彼时，同盟会总会的机关报《民报》无法直接寄回国内，革命党人便将《民报》伪装成《心理学教科书》，与《夏声》杂志一同寄往西安的公益书局。公益书局的创办人是同盟会成员，这里便成了秘密发行据点。省城青年学生纷纷前来购书，久而久之，这里不仅是书刊销售点，更成了同盟会员和进步士绅的秘密聚会地与通讯机关。赵世钰在《回顾录》中写道：“省城学生往者络绎，久之变省城之通讯机关矣。亦即为盟员士绅之聚会地。”

《夏声》的影响力远不止于西安城内。它与同盟会各省分会创办的《云南》《四川》《河南》等刊物齐名，发行9期，广泛传播于陕西及西北各地。刊物以笔为刃，抨击封建专制，介绍西方民主思想，号召民众起来革命，在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引发强烈反响，为陕西民主革命运动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夏声》的意义不仅体现在舆论宣传层面，更在于它成为陕西乃至西北革命力量的联络枢纽。

《夏声》杂志社成立后，革命志士以刊物为中心，广泛联络各方力量。在日本东京，他们联络了豫晋秦陇协会、全国留学生总会等团体；在国内，他们则通过刊物与陕西本地教育会、商会等机构建立联系。《夏声》像一条纽带，将陕西留日学生、赴日考察志士、西北各省进步团体以及同盟会总会紧密联结在一起。

随着革命力量的不断汇聚壮大，《夏声》杂志社成为陕西革命运动的指挥中心之一。赵世钰回忆：“初皆以《夏声》杂志为总枢……随后即与省内外同志商决，派人归国，开展革命运动工作。”正是以《夏声》为依托，同盟会陕西分会得以凝聚力量，策划并推动了后续一系列革命活动，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爆发埋下了伏笔。

百余年后，当我们再读《夏声》的文字，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穿透历史的力量。它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承载着一群青年学子的救国理想。它以笔为武器、以刊物为阵地，不仅传播了革命思想，更凝聚了革命力量，为陕西近代民主革命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如今，这些泛黄的书页静静躺在文史馆的珍宝库里。它们是那段峥嵘岁月的见证者，也是留给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回望《夏声》的故事，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份杂志的兴衰，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勇担使命的家国情怀。这份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们铭记历史、砥砺前行。

征稿启事

为突出政协特色，发掘政协文化文史资源，本报对《记忆》版面进行改版，开设《文化》《岁月》两个专版，轮替出刊。

《文化》专版，以弘扬民族文化、探寻时代生活、折射文化价值、彰显人文关怀为宗旨，开设《悦读书吧》《似水流年》《往事如烟》《美文小札》《佳作欣赏》《光影瞬间》等栏目，刊发读书、随笔、散文、书法、绘画、摄影等佳作。

《岁月》专版，以传承红色基因、弘扬民族精神为宗旨，展现我省各级政协文史工作成果，开设《红色记忆》《三秦史话》《史海钩沉》《人文风物》等栏目，凸显地域特色，讲求事实准确、故事性强。

以上稿件均要求原创，欢迎各级政协委员、政协工作者和广大读者踊跃投稿，优稿优酬。

投稿邮箱：
gejiedb2002@126.com
联系电话：029-63903884

《各界导报》编辑部